

2017年度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

两汉祭祀文化研究

张 影 邬晓东 著



HEUP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2017 年度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

两汉祭祀文化研究

LIANGHAN JISI WENHUA YANJIU

张 影 邬晓东 著

HEUP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在中国历史上,两汉思想活跃,各种思潮纷纷兴起,是文化发展和繁荣的一个重要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在两汉时期是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是两汉时期国家政治生活和普通百姓生活中的大事,同时也是研究两汉文化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方面。本书在文化的视野下结合考古学、文献学等资料对两汉祭祀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研究,以两汉时期的一些重要祭祀礼仪文化制度、祭祀神灵和祭祀文本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考察了两汉祭祀文化礼俗及其意蕴,探讨了两汉祭祀文化兴盛对两汉政治文化的影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汉祭祀文化研究 / 张影, 邬晓东著. —哈尔滨: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2017. 11
ISBN 978 - 7 - 5661 - 1777 - 9

I. ①两… II. ①张… ②邬… III. ①祭祀 - 文化研
究 - 中国 - 汉代 IV. ①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13439 号

选题策划 龚 晨
责任编辑 张忠远 马毓聪
封面设计 佟 玉

出版发行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南通大街 145 号
邮政编码 150001
发行电话 0451 - 82519328
传 真 0451 - 8251969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 张 8
字 数 193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80 元

<http://www.hrbeupress.com>

E-mail: heupress@hrbeu.edu.cn

前 言

汉代是中国封建王朝中经济昌盛、政治统一、文化繁荣的时代,也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上升阶段。在这繁盛的时代,各种思潮滥觞,又因汉代帝王好祭祀,信鬼神,所以巫风盛行,神学思想发达。诚如著名学者曹书杰先生评论上古时代的后稷文化时指出的“后稷文化是人们对所依赖的农业生产活动、农业经济价值的认同”(曹书杰:《后稷传说与稷祀文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汉代祭祀文化也具有同样的农业社会特征,即汉代祭祀文化的兴盛促进了汉代祭祀诗的发展,产生了《郊祀歌》十九章、《安世房中歌》等。汉代阴阳、灾异、谶纬、求仙长生等各种思想盛行,这些思想必然会影响到祭祀活动。如阴阳五行、灾异、谶纬、天人感应等思想成为祭祀的指导思想,而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思想直接影响并引导帝王的祭祀仪轨。汉代祭祀活动较先秦时期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祭祀神灵系统、祭祀心态等都发生了变化。汉代祭祀兴盛有着一定的政治原因,汉代确立了天神“太一”在神灵祭祀中的最高地位。汉代人尊天,认为天的权利至高无上,通过祭祀宣扬皇权天授,高不可攀,以达到维护其大一统的政治目的。

本书从中国古代文化的角度切入,将两汉时期的祭祀制度、祭祀礼仪与文学现象结合,细微观察,深入阐发,每有新意。同时在梳理两汉礼乐文化制度和神灵系统建构的基础上,使两汉祭祀的政治、社会、伦理三大功能得以充分体现。并以汉代文化为切入点,阐述分析《郊祀歌》《安世房中歌》对先秦祭祀诗的创新及其体现的两汉祭祀文化心态的变化。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的、文化的坐标,同时也是文学的图景。本书对于研究两汉文学、两汉文化史及礼仪制度,无疑具有一定的文献参考意义。

两汉祭祀文化内容广博,同时由于本人学识尚浅和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以致本研究还存在一些疏漏不当之处,在此恳请方家指正。

张 影

2017年7月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二章 汉代礼乐制度研究	7
第一节 汉初的礼乐建设	7
第二节 武帝时期的礼乐建设	10
第三节 东汉时期的礼制建设	18
第四节 汉代儒生对汉代礼乐的论述	25
第三章 两汉时期的祭祀系统建构	36
第一节 两汉初期的祭祀系统建构	36
第二节 两汉时期的祭祀神灵系统	42
第三节 两汉祭祀的社会功能	50
第四章 两汉民间祭祀研究	55
第一节 祭祖	56
第二节 汉代民间其他祭祀信仰	59
第五章 两汉祭歌研究	72
第一节 汉《郊祀歌》文化考察	72
第二节 《安世房中歌》文化考察	84
附录 A 安世房中歌	89
附录 B 郊祀歌	94
参考文献	118

第一章 导 论

一、选题缘起

汉代文化与文学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近年来随着汉代大批文物的出土,无疑会再一次引起汉代文化研究的高潮。学界关于汉代的研究专题很多,基本上可归为历史和文学两大类。从史学角度,主要研究汉代的经济、政治、文化、历史事件、著名人物等;从文学角度,主要按照诗、赋、文等进行文体分类研究,对其进行注释、校勘,然后阐释文学成就与社会意义及作家的生平、际遇,进行追索,研究作品形成的原因和社会意义等。对汉代的研究不应是割裂式和片面式的研究,而应是从经济、政治、文化、文学、思想等方面进行多角度结合研究。汉代的文化包括很多方面,祭祀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种文化现象。

祭祀是我国最为古老的一种文化,在原始先民之初就已经产生了图腾崇拜、自然神崇拜、祖先崇拜等思想。祭祀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古人祭祀有求吉祥之意,因此,祭礼又被称为吉礼。祭祀在人们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古代五礼之首。《礼记·礼运》云:“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蕢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周礼·春官·大宗伯》将五礼分为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先秦时期,祭祀是君王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左传·成公十三年》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可以说,上至最高统治者,下及底层平民,祭祀都是其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祭祀本身而言,它所包含的社会意义,除宗教意义、民俗文化意义、政治意义外,还有文学意义,许多祭祀礼神诗流传后世成为名篇,在《诗经》和《楚辞》里都可以看到。《礼记·祭统》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急于祭。”梁启超认为:“有人与神与天相接之礼,则祭礼是。故曰:‘礼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也。’”(《礼记·礼运》)诸礼之中,惟祭尤重。盖礼之所以能范围群伦,实植本于宗教思想,故祭礼又为诸礼总持焉。”^①

祭祀活动发展到汉代并没有因为阶级政权的加强而衰落,反而达到了一个高峰,祭祀活动频繁。《风俗通义·祀典》记述:“自高祖受命,郊祀祈望,世有所增,武帝尤敬鬼神,于时盛矣。至平帝时,天地六宗已下,及诸小神,凡千七百所。”据

^① 梁启超:《国史研究六篇》,中华书局,1947,第341页。

《汉书·郊祀志》载,汉成帝晚年由于没有子嗣的缘故,十分注重鬼神祭祀:“成帝末年颇好鬼神,亦以无继嗣故,多上书言祭祀方术者,皆得待诏,祠祭上林苑中长安城旁,费用甚多。”汉成帝时由国家派专官祠祀的诸神之庙已有 683 所,民间的神庙尚不在内。“当时自皇帝、诸侯王以至地方官的祭祀,都有巫祝降神,美酒媚神,肥猪肥牛饗神,并且有乐队迎神送神。”^①王莽对祭祀则达到了痴迷的程度:“王翁好卜筮,信时日,而笃于事鬼神,多作庙兆,洁斋祀祭。牺牲穀膳之费,史卒辨治之苦,不可称道。为政不善,见叛天下。及难作兵起,无权策以自救解,乃驰之南郊告祷,搏心言冤,号兴流涕,叩头请命,幸天哀助之也。当兵入宫日,矢射交集,燔火大起,逃渐台下,尚抱其符命书及所作威斗。可谓蔽惑至甚矣。”^②汉代的各项祭祀活动,在上承古制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汉代人认为祭祀已经是生活中平常而不可缺少的一件事情,正如《后汉书·祭祀》所记载:“祭祀之道,自生民以来则有之矣。豺獭知祭祀,而况人乎。”史籍所见两汉时期的祭祀活动不但是时人精神生活中的头等大事,而且也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祭祀文化对汉代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样也对汉代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促进并丰富了汉代文学的发展。在研究汉代文学、文化时不能不关注这一重要的文化现象。

二、研究现状

两汉时期经学神学化,宗教、谶纬、迷信猖獗,巫术方士盛行,祭祀活动频繁。祭祀之兴盛对汉代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譬如促进了文学的发展,以致研究两汉文学、文化无法回避这一重要文化现象。当前,学者对两汉祭祀文化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史学角度进行的研究

两汉至五四时期学人对于两汉祭祀的研究多是一些文献典章的记录,如《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唐代杜佑的《通典》对唐以前的祭祀制度进行了梳理,以及后来的《资治通鉴》《文献通考》《礼书》也只是从典章制度角度对两汉祭祀制度加以记录。这一时期也有一些弥足珍贵的研究,如清人秦蕙田的《五礼通考》,对我国古代国家祭祀制度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考证。但《五礼通考》是结合清代祭祀制度对我国古代祭祀制度的一种梳理和考辨,对两汉祭祀文化未进行专题研究。

当代学人从史学角度研究两汉祭祀文化的比较多,主要关注两汉祭祀文化与制度的关系。陈戍国的《秦汉礼制研究》和王柏中的《神灵世界秩序的构建与仪式的象征——两汉国家祭祀制度研究》等,都是从礼仪制度与国家政治关系的角度对

① 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第556页。

② (汉)桓谭:《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第14页。

两汉国家祭祀进行研究,对地方的祭祀制度和民俗并未谈及。田天的《秦汉国家祭祀史稿》从史学和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对秦汉国家祭祀变迁及其与地理格局的变动、历史背景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此外,张鹤泉的《汉明帝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彭林的《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中华书局2005年版),曹书杰师的《后稷传说与稷祀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何星亮的《中国自然崇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张一兵的《明堂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詹鄞鑫的《神灵与祭祀——中国传统宗教综论》(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傅亚庶的《中国上古祭祀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瞿明安、邓萍的《沟通人神——中国祭祀文化象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版),徐国康主编的《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文镛盛的《中国古代社会的巫觋》(华文出版社1999年版)等都对汉代一些重要的祭祀礼仪与文化进行了介绍和研究。至今对两汉祭祀的研究还多停留在历史文献、典章制度、历史地理等角度,少有学者在文化的大背景下对两汉祭祀进行系统研究,此外,对地方祭祀制度和民俗以及文艺美学等其他方面也少有学人谈及。

有关两汉祭祀文化的综合性研究论文甚少,但其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祭祀礼仪制度及习俗的研究,另一类是重要神灵研究。当代学者对两汉祭祀礼仪关注的焦点主要在郊祀礼、封禅礼、农业祭祀等,主要从文化制度角度对祭祀礼仪进行研究,对祭礼与文学的关系研究的深度远远不够,如徐迎花的《东汉光武帝时期郊祀制度研究》、杨英的《东汉郊祀考》等,只对郊祀礼仪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和介绍,对东汉郊祀礼兴盛的原因以及其对政治、文学的影响并未提及。

(二) 从神话学角度进行的研究

两汉时期信仰、崇拜的神灵很多。从神话学角度研究两汉的神灵,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伏羲、女娲、“太一”、西王母等诸神。当今学者对这些神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原型、神话流传、演变过程等方面。

学者们一般关注的是伏羲、女娲传说的原型、神格和神话传说的文化意义等。从神话学角度研究伏羲的学者有孙玮、孙海洲、何新、刘雁翔、李炳海、常金仓等。新时期以来,女娲研究的中心问题主要集中在女娲神话的流传、演变,伏羲、女娲的关系,女娲的族属及其原型和社会文化史的意义等方面。杨利慧的《女娲的神话与信仰》《女娲溯源——女娲信仰起源地的再推测》二书可以说是近年来女娲研究的总结。近年来学者对“太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学、宗教两个方面。从哲学角度,学者认为“太一”是宇宙的本原;从宗教方面,则认为“太一”是宗教神灵。学者们对“太一”的神格和流传进行了梳理和考察,但对汉代“太一”祭祀兴盛的原因和“太一”祭祀的文化意蕴还未论及。西王母是当代学者研究的热点。从历史学、地理学的角度解读西王母原型的,有王伟章的《西王母形象考》,王卫东、曾煜的《西王母原型新探——上古巫文化研究之四》等;从宗教角度研究西王母宗教神学思想

及受崇拜的原因的,有李东峰、杨文艳的《汉代西王母与东王公神话的历史考察》,周静的《两汉时期的西王母信仰》等;还有的以画像石、铜镜铭文等作为第一手材料,如汪小洋的《汉画像石中西王母中心的形成与宗教意义》、郑先兴的《汉画中的西王母神话与西王母崇拜》等。

汉代诸神灵研究,学者们或从宗教学或从神话传说角度去探究神灵原型,还未有学者从汉代祭祀文化的源流角度去探讨这些神灵崇拜祭祀兴盛的原因,神格的发展演变历程以及这些神灵崇拜祭祀兴盛对祭祀文学的影响。汉代神话应与历史、经学、子学、社会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相联系,应在宏大的文化背景之下,发掘汉代文学中的神话与汉代文学乃至汉文化建构的交互关系。学者们目前只是对汉代神灵进行专题研究,没有对汉代祭祀神灵系统给予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因此对汉代祭祀神灵的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三) 祭祀礼仪与两汉祭祀文学研究

当今学者对两汉祭祀文学的研究多伴随对祭祀礼仪的研究一起进行,其主要可分为汉赋与祭祀文化的关系、祭祀诗与文化的关系、封禅文学三类。

汉赋与祭祀文化的关系研究,主要从宗教思想对文学的影响和文学对政治的反映来进行研究,如王振军的硕士论文《汉赋与汉代国家宗教研究》主要从郊祀礼、明堂制度、封禅祀典、“太一”崇拜等方面阐述了两汉国家宗教对汉赋和赋家的渗透和影响。

祭祀诗研究主要针对祭祀礼乐制度进行研究,而未对祭祀诗的文学性、祭祀诗与《诗经》《楚辞》的承继关系,以及祭祀诗中的神系与《楚辞》和《诗经》中祭祀神系的关系进行研究,如许倩的《汉〈郊祀歌〉与汉武帝时期的郊祀》一文只考述了郊祀制度的宗教思想与用乐制度,对《郊祀歌》的文学性并未论及。

封禅文学研究,主要从礼仪文化的角度对封禅文学进行研究,如杨晓芳的硕士论文《封禅文学研究》从封禅的源起与封禅历史、封禅的思想基础、封禅礼乐、封禅的现实功效等方面来阐述封禅文学的内容及思想。但迄今为止,全面、系统地从事文化角度研究两汉祭祀文学的论文还鲜见。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目前学者对两汉祭祀文化和祭祀文学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祭祀礼仪文化制度、文学对政治或宗教思想的反映方面,很少有学者针对祭祀文学本身进行研究,尤其是对祭祀散文进行研究。近年来学者对两汉文学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诗、赋方面,对祭祀文学的关注还不够,对两汉祭祀文学和楚文学、文化的关系的研究也很少,关于汉代祭祀文化的源流问题几乎没有学者问津。

另外,还未有学者系统地对两汉祭祀礼制的发展加以系统的梳理和分析。两汉祭祀礼制问题研究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本书试图在更加宏观的视野下对汉代祭祀文化与祭祀文学进行一次系统梳理与研究。本书所涉及的汉文是一个广义的概念。许慎《说文解字》把“文”解释为

“错画也”，意思是“对事物形象进行整体素描，笔画交错，相联相络，不可解构”，所以本书中的汉文不单单指的是文体上的汉文，而是指汉代所有文字的载体，包括典籍、简帛、青铜器、碑刻等，以及与祭祀有关的画像石等。汉代凡是有文字的记录或与祭祀相关的内容都在本书研究范围内。

对两汉祭祀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国外汉学家还未形成一个严整的系统，只有一些散篇的论文。例如，国外学者对泰山封禅的研究，由于对中国文化了解有限，主要对泰山史迹与封禅祭祀进行了一般介绍，并没有深入探讨，如德国学者切柏的《泰山及其国家祀典》，法国学者沙畹的《泰山：中国宗教研究》，日本学者桥本增吉的《关于〈史记·封禅书〉》、木树英一的《封禅思想的成立》、串谷美智子的《封禅的二重性——宗教性与政治性》等。还有一些学者从神话入手研究祭祀神灵，如B·李福清（俄）的《从比较神话学角度看闻一多〈伏羲考〉》认为伏羲是中国的古代文化英雄。关于女娲神话发源地，国外一些学者也进行了研究，如白川静（日）、谷野典之（日）、B·李福清（俄）等持女娲的发源地南方说。随着考古发掘的进展，西王母画像石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如简·詹姆斯（美）的《汉代西王母的图像志研究》等。但国外学者还未将两汉的祭祀神灵与文学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三、研究两汉祭祀文化的学术价值

古代文化包括很多方面，其中祭祀是一种重要的宗教礼仪文化。

祭祀起源很早，古人为了祭祀求吉祥把祭祀礼仪称为吉礼，吉礼是我国古代五种重要的礼仪之一。《礼记·祭统》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急于祭。”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就产生了万物有灵和灵魂不灭的观念，因而人们对死去的祖先进行祭祀，向他们祈福。有些传说中的祖先最后幻化成一个部族或国家的祖先神。由于远古人们的思想还不够发达，在万物有灵、图腾崇拜等观念的作用下人们对一些自然物、自然现象也进行祭祀。

祭祀活动除了具有纪念意义外，从本质上来说最重要的是人的功利性，是古人把人与人之间的求索酬报关系推广到人神之间而产生的活动，对人类无法理解和无法达到的目的寻求一种心灵上的自慰和满足。因此，其具体的表现形式是向神献礼、致敬、祈祷。这种功利性与人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程度有关，人们往往把自身无法办到的事情寄托于神灵。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阶级和国家的出现，祭祀与国家政权联系在一起，使其在国家社会生活的地位逐渐提高，成为古代五礼之首。詹鄞鑫在《神灵与祭祀——中国传统宗教综论》一书中认为，古人之所以看重祭祀，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出于对神灵所代表的自然力的崇拜。另一方面，随着文明的发展，在鬼神崇拜逐渐淡化的同时，由于神权与政权的合一，祭祀

的政治意义日益显得浓厚起来。”^①

祭祀与政治结合后,不仅没有随鬼神崇拜的淡化而逐渐衰落,反而越来越强盛。随着祭祀礼仪的发展产生了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等级分明、规范严格的祭祀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祭祀是国家的头等大事,祭祀与争夺领土、树立权威的战争相提并论,同时也是显现宗法地位的主要标志。

祭祀在上层社会形成了严格的规范,而平民阶层则在允许的范围内形成祭祀习俗,祭祀行为因而形成了“礼”和“俗”两大支流,承传于数千年的历史洪流之中,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磨合,最后合而为一,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祭祀文化传统。这个传统不仅抚慰了人们心灵的空虚与不安,也维系了上层社会对人民的统治及对人民的凝聚和团结。祭祀的政治、社会、伦理三大功能得以充分体现。祭祀成为维系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支柱,祭祀的礼仪成为每个人共同遵守的准则。因此祭祀对古代人们生活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同样,祭祀对两汉的文化、政治、经济、思想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汉代重祭祀之风受楚人影响很大。楚人崇尚巫风,“畏鬼”“信祀”,而且楚地也有很多关于鬼神的传说,汉代上层统治集团中帝王及一些大臣都来自楚地,对楚地的这一传统给予了继承和发扬。《风俗通义·祀典》记述:“自高祖受命,郊祀祈望,世有所增,武帝尤敬鬼神,于时盛矣。至平帝时,天地六宗已下,及诸小神,凡千七百所。”

汉代的各项祭祀活动,在上承古制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汉代人认为祭祀已经是生活中平常而不可缺少的一件事情,正如《后汉书·祭祀》所记载:“祭祀之道,自生民以来则有之矣。豺獭知祭祀,而况人乎。”史籍所见两汉时期的祭祀活动不仅是时人精神生活中的头等大事,而且也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论衡·祀义》曰:“世信祭祀,以为祭祀者必有福,不祭祀者必有祸。是以病作卜崇,崇得修祀,祀毕意解,意解病已,执以为祭祀之助,勉奉不绝。”^②

两汉时期宗教、谶纬、迷信猖獗,方士人数规模庞大,巫术盛行,祭祀活动频繁,遍及社会各方面。祭祀文化对两汉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祭祀的兴盛也对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促进了文学的发展,研究两汉文学、文化、历史、政治都无法回避这一重要文化现象。以往的文学史中对两汉祭祀文学谈之甚少,有的甚至避而不谈。本书力在凸显祭祀文学及文化在两汉文学史中的地位,此研究对于汉代文化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书中对各位先生直呼姓名,并非不敬,只为行文简洁,敬请见谅。

① 詹鄞鑫:《神灵与祭祀——中国传统宗教综论》,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第181页。

② (汉)王充著,张宗祥校注,郑绍昌标点:《论衡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第504页。

第二章 汉代礼乐制度研究

中国自古为礼仪之邦,礼乐教化在国家的统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相传周公制礼作乐,周礼作为各级贵族政治和生活的准则,是维护宗法制度不可或缺的工具。《说文解字》曰:“礼,覆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丰,丰亦声。”^①《礼记·曲礼》:“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乐制度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奠定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基调。自此,礼乐教化成为历代帝王治理国家的重要辅助手段。汉朝时期帝王把礼乐教化作为治国的一个重要手段,汉代历代帝王也在不断地进行礼乐文化建设和改革。

第一节 汉初的礼乐建设

一、汉初对秦礼乐制度的继承与批判

汉代建国之初即进行了礼乐制度建设,据《汉书·礼乐志》载:“汉兴,拨乱反正,日不暇给,犹命叔孙通制礼仪,以正君臣之位。”叔孙通被立为奉常,制定汉代的礼仪制度,但礼仪法制未尽完备而叔孙通去世。关于叔孙通如何制定汉礼史书没有详细记载,只能略见一斑。如《史记·叔孙通列传》记载叔孙通“定宗庙仪法”,“乃稍定汉诸仪法,皆通所论箸也。”可见汉初的礼法都是叔孙通制定的。据《汉书·礼乐志》载,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王充《论衡》云:“高祖诏叔孙通制作《仪品》……而复定仪礼。”^②《后汉书·曹褒传》:“章和元年正月……令小黄门持班固所上叔孙通《汉仪》十二篇。”《钦定仪礼义疏》(卷上)述:“班氏固曰:‘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奉常,诸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

汉初的礼乐制度基本承袭秦制。叔孙通开始所设定的朝仪,是“颇采古礼与秦

①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第2页。

② (汉)王充著,张宗祥校注,郑绍昌标点:《论衡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第258页。

仪杂就之”。后来又制定的宗庙仪法及汉诸仪法,大多承袭了秦代的礼仪制度,所谓“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改变^①。”

汉在宗庙用乐方面,对秦及先秦古乐有所继承。比如,“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又周有《房中乐》,至秦名曰《寿人》,而高祖姬唐山夫人作有《房中祠乐》,对秦的《寿人》(即周《房中乐》),也必有所因袭和借鉴。汉惠帝二年,更在《房中祠乐》的基础上,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又高祖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庙奏《昭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其中,《文始舞》是为秦所保存的舜的《招舞》,汉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五行舞》是秦所保存的周武王的《大武》,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五行》。又高祖六年作《礼容乐》,也出之于《文始舞》和《五行舞》。因此,汉初的宗庙乐、房中乐,高祖太宗庙舞,高祖所作的《礼容乐》,以及“舞人无乐者,将至至尊之前不敢以乐也;出用乐者,言舞不失节,能以乐终也。大氏皆因秦旧事焉^②。”

在礼乐方面承秦制,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反对,他们批评秦的无礼义和坏制度。陆贾、贾山、贾谊、晁错、邹阳等人,都有这方面的议论。

劝刘邦治天下当以仁义、主张“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③的陆贾认为,秦的国灭、君亡,是废仁义礼乐而尚刑罚武力的结果。秦始皇使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治法于内,事越烦,天下越乱,法越滋,而奸邪越炽,兵马越设,而敌越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④也就是说,不行礼义而尚刑罚,因而奸邪多、制度乱。

高祖即位,置祠祀官,有秦、晋、梁、荆之巫。至汉文帝时天下风气大坏,贾谊上疏请求制礼,再次强调礼治的重要:“汉承秦之败俗,废礼义,捐廉耻,今其甚者杀父兄,盗者取庙器,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为故,至于风俗流溢,恬而不怪,以为是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纲纪有序,六亲和睦,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人之所设,不为不立,不修则坏。汉兴至今二十余年,宜定制度,兴礼乐,然后诸侯轨道,百姓素朴,狱讼衰息。”于是汉文帝令贾谊“草具其仪,天子说焉”,但“大臣绌、灌之属害之,故其议遂寝”。^⑤

① (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2005,第1159-1160页。

②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2007,第1044页。

③ 陆贾:《新语》,收入《诸子集成》第7册,中华书局,1954,点校本,第3页。

④ 同上书,第7页。

⑤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2007,第1130页。

作为礼的重要方面的正朔、服色,汉初基本上也沿用秦制。秦始皇即位的时候,因周得火德,有人依据阴阳相生相克的道理,认为秦当为水德。“昔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于是秦更名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尚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①秦亡,刘邦为汉王。刘邦即以秦二世四年十月为汉元年十月,作为年岁之首,这是沿用秦正朔的开始,但“色尚赤”。汉代沿用秦正朔不变,伏胜首先表示不同意。他明确指出,夏以十三月(即正月)为正,色尚黑,以平旦为朔;殷以上二月为正,色尚白,以鸡鸣为朔;周以十一月为正,色尚赤,以夜半为朔。三统者所序生,三正者所以统天下,“夏以孟春为正者贵形也”。^②伏胜主张三统说,行夏正,以孟春(即正月)为岁首,因夏色尚黑,故服色尚黑。张苍认为尚水德,《汉书·律历制》曰:“汉兴,方纲纪大基,庶事草创,袭秦正朔。以北平侯张苍言,用《颛顼历》,比于六历,疏阔中最为微近。”又《汉书·张周赵任申屠传第十二》有云:“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初定,公卿皆军吏,苍为计相时,绪正律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时本十月为岁首,不革。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上黑如故。”

汉文帝、汉武帝时正朔改变的问题一直争议很大。贾谊不同意汉承袭秦的服色,在文帝元年,上疏汉当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黄,数用五”^③。张苍、周勃、灌婴、东阳侯、冯敬等人反对,同时汉文帝认为不应改制,所以改制没有成功。

汉文帝十四年,鲁人公孙臣上书,秦为水德,据终始五德之传,汉受秦,则当土德,土德的征兆是出现黄龙,故“宜改正朔,服色上黄”^④。但张苍坚持汉当袭秦水德,“河决金堤,是其符。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内赤,与德相应”^⑤。于是,公孙臣改正朔服色为非,被罢免。但明年,黄龙出现于成纪,这是土德的征兆,为此,汉文帝又召见公孙臣,并拜为博士,“与诸生申明土德,草改历、服色事”。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上,言“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若人冠冕焉。或曰东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应”^⑥。于是作渭阳五帝庙,同宇,帝一殿,面五门,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仪亦如雍五畤。汉文帝十七年(后元年)有人上书告新垣平的言论是欺诈。新垣平惧怕被诛谋反,于是夷三族。自此以后改正朔之事被搁置。

汉景帝时,窦太后好黄老之术,没有改革正朔。可见,汉初正朔服色问题是一直争论没有解决的问题。

①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2007,第1200-1201页。

② 朱维铮主编,伏生撰,郑玄注,陈寿祺辑校:《中国经学史基本丛书》第一册《尚书大传》,上海书店,2012,第49页。

③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2007,第2222页。

④ 同上书,第1212页。

⑤ 同上。

⑥ 同上书,第1213页。

二、祭祀礼仪初设

汉初,汉高祖刘邦在秦已有的神灵系统基础上进一步建构汉代的神灵系统,高祖二年设五帝祠,“有司进祠,上不亲往。悉召故秦祝官,复置太祝、太宰,如其故仪礼。因令县为公社”。又下诏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①高祖六年初设汉代祭祀系统,在丰设枌榆社,常以时祭。长安设蚩尤祠,长安设祠祀官、女巫,并且进行了分工:“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属;晋巫祠五帝、东君、云中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属;秦巫祠杜主、巫保、族累之属;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属;九天巫祠九天:皆以岁时祠宫中。其河巫祠河于临晋,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②

第二节 武帝时期的礼乐建设

“武帝即位,进用英隽,议立明堂,制礼服,以兴太平。会窦太后好黄老言,不说儒术,其事又废。”^③窦太后崩后,汉武帝改变汉初的提倡黄老之学的风气,提倡儒学,重用儒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礼制的建设趋向儒家化。

一、确立“太一”的核心地位

据《汉书·郊祀志》记载,汉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艾安,缙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窦太后不好儒术,使人微伺赵绾等奸利事,按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皆废。六年,窦太后崩。其明年,征文学之士”。汉武帝建立礼制的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确立“太一”为最高天神。窦太后去世二年,亳人缪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东南郊,日一太牢,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于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长安城东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后,人上书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许之,令太祝领祠之于忌泰一坛上,如其方。”^④

二、封禅改历以立汉正朔服色

汉武帝尤敬鬼神之祀,在即位之初就有修改历法和服色的愿望,但由于窦太后

①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2007,第1210页。

② 同上书,第1211页。

③ 同上书,第1031页。

④ 同上书,第1218页。

的阻挠没有成功。窦太后死后,汉武帝获宝鼎又重新开始制定历法和服色之事。汉武帝欲举行封禅典礼,命群儒制定封禅仪未果。“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封禅用希旷绝,莫如其仪体,而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齐人丁公年九十余,曰:‘封禅者,古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无风雨,遂上封矣。’上于是乃令诸儒习射牛,草封禅仪。数年,至且行。天子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欲放黄帝以接神人蓬莱,高世比德于九皇,而颇采儒术以文之。群儒既已不能辩明封禅事,又拘于《诗》、《书》古文而不敢聘。上为封祠器视群儒,群儒或曰‘不与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周霸属图封事,于是上黜偃、霸,而尽罢诸儒弗用。”^①倪宽“及议欲放古巡狩封禅之事,诸儒对者五十余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马相如病死,有遗书,颂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②。

可以说,司马相如的《封禅文》对汉武帝刘彻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举行的第一次封禅大典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推动了汉武帝封禅大典的举行。“上奇其书,以问宽,宽对曰:‘陛下躬发圣德,统辑群元,宗祀天地,荐礼百神,精神所乡,征兆必报,天地并应,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禅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节也。然享荐之义,不著于经,以为封禅告成,合祛于天地神祇,祇戒精专以接神明。总百官之职,各称事宜而为之节文。唯圣主所由,制定其当,非君臣之所能列。令将举大事,优游数年,使群臣得人自尽,终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极,兼总条贯,金声而玉振之,以顺成天庆,垂万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仪,采儒术以文焉。”^③于是汉武帝在元封元年四月东封泰山,下令改元,更年号为元封。据《史记·封禅书》载,古代封泰山、禅梁父的有七十二代的帝王,著名的有无怀氏、伏羲、神农氏、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周成王等。汉武帝之前帝王封禅活动的具体细节在文献资料中很少提及。《史记·封禅书》记载了武帝封禅一事:“四月……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荐绅,射牛行事。封泰山下东方,如郊祠泰一之礼。封广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则有玉牒书,书秘。礼毕,天子独与侍中奉车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阴道。丙辰,禅泰山下址东北肃然山,如祭后土礼。天子皆亲拜见,衣上黄而尽用乐焉。江淮间一茅三脊为神藉。五色土益杂封。纵远方奇兽蜚禽及白雉诸物,颇以加礼。兕牛犀象之属不用。皆至泰山祭后土。”

汉武帝在元封元年东封泰山,令诸侯在泰山建房舍,“古者天子五载一巡狩,用事泰山,诸侯有朝宿地。其令诸侯各治邸泰山下”^④。将汉代有封爵的人和泰山联

①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2007,第1233页。

② 同上书,第2630页。

③ 同上。

④ (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2005,第1398页。

系在一起,可见封禅泰山在汉代人心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增加了泰山的影响。

汉武帝巡狩活动有多次,据《史记·封禅书》和《汉书·武帝纪》,武帝巡狩和封禅的活动有八次:

1. 太初,“三年春正月,行东巡海上。夏四月,还,修封泰山”(《汉书·武帝纪》)。

2. 天汉,“二年春,行幸东海”(《汉书·武帝纪》)。

3. 太始三年,“行幸东海,获赤雁,作《朱雁之歌》。幸琅琊,礼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汉书·武帝纪》)。

4. 太始,“四年春三月,行幸泰山。……夏四月,幸不其,祠神人于交门宫,若有向坐拜者。作《交门之歌》”(《汉书·武帝纪》)。

5. 征和,“四年春正月,行幸东莱,临大海”“三月……还幸泰山,修封”(《汉书·武帝纪》)。

6. 元鼎四年,“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宝鼎》、《天马》之歌”(《汉书·武帝纪》)。

7. “往者朕郊见上帝,西登陇首,获白麟以馈宗庙”(《汉书·武帝纪》)。

8. 元封元年三月,武帝东上泰山立石之后,“遂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史记·封禅书》)。元封元年四月,汉武帝登泰山行封禅之礼。

封禅不但是一项国家宗教活动,同时也是一项政治活动,封禅向天下昭示皇权的合法性和唯一性,同时也有利于大一统的政治方针的有效实施。

汉初运用的历法是承袭自秦的《颛顼历》,有很多弊病。“汉兴,方纲纪大基,庶事草创,袭秦正朔。以北平侯张苍言,用《颛顼历》,比于六历,疏阔中最为微近。然正朔服色,未睹其真,而朔晦月见,弦望满亏,多非是。”于是在元封七年的时候大臣向汉武帝进谏修改历法,“至武帝元封七年,汉兴百二岁矣,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等言‘历纪坏废,宜改正朔’。是时御史大夫倪宽明经术,上乃诏宽曰:‘与博士共议,今宜何以为正朔?服色何上?’宽与博士赐等议,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于天也。创业变改,制不相复,推传序文,则今夏时也。臣等闻学褊陋,不能明。陛下躬圣发愤,昭配天地,臣愚以为三统之制,后圣复前圣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统绝而不序矣,唯陛下发圣德,宣考天地四时之极,则顺阴阳以定大明之制,为万世则。’于是乃诏御史曰:‘乃者有司言历未定,广延宣问,以考星度,未能讎也。盖闻古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发敛,定清浊,起五部,建气物分数。然则上矣。书缺乐弛,朕甚难之。依违以惟,未能修明。其以七年为元年。’遂诏卿、遂、迁与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议造《汉历》。”^①后人称其为《太初历》,共使用了188年,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汉族历法,也是当时世界上最

①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2007,第974页。